

# 蔣介石研究的新階段

[日本]川島真 撰 薛軼群 譯

## 一、民國史研究的進展與蔣介石研究

1980年代以後，中國近代史學界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民國史”研究的熱潮，迄今已過了30餘年。回首往昔，民國史的進展過程中有著以下若干背景：

第一，民國史的推動與當時改革開放的政策是相關聯的。在革命史觀影響下，民國時期活躍的資本家都被認為是反動、反革命的。而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進行了一定調整的同時，對近代史的敘述也有所改變。以民國時期的商會等資本家團體為對象的研究出現，可視為民國史研究進展的一個象徵。

第二，民國史的發展與對台灣的統戰也有關係。此前，中共對國民黨的評價很低，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也避而不談，然而民國史的進展修正了這些看法，尤其是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貢獻越來越受到肯定。而透過民國史的興起，海峽兩岸歷史學者的對話也日趨活躍。

然而，在包括日本的海外學者看來，民國史研究的意涵可能跟中國學者有所不同，海外學者推動民國史研究的基本動力是出於挑戰所謂的“革命史觀”，這也是民國史研究的魅力所在。而中國也存在類似的傾向，即在中國國內，重視“發展”，“革命”的地位就相對弱化，對於革命史的反思也會增強。這也是民國史研究順應時代潮流而衍生的一大成果。

時至今日，民國史研究在各個地區的諸多學者的努力下，已呈現多元化的趨勢，而《蔣介石日記》的公開，也掀起了一股民國史的新熱潮。關於蔣介石的實證研究不斷被推進，以階級鬥爭史觀分析民國史的研究大幅減少，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成為一大矚目焦點。而國共兩黨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認識分歧，也在兩岸的學者之間引發了熱議。從該意義而言，可認為《蔣介石日記》為兩岸的歷史研究構築了新的平臺。

另一方面，對包括日本在內的海外研究者而言，《蔣介石日記》雖然意義重大，但就諸如中國近代史的國共詮釋有所不同等問題，很少從中立的立場出發將克服這一差異作為研究課題。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多被用於考察“實證性”的問題，即日記的公開與大量檔案被公開一樣，對揭秘歷史事實的“期待”進一步提高。

由此可見，圍繞民國史研究及蔣介石日記的環境，也因地因人而異，呈現多樣化的特點。

## 二、史料的大量公開與蔣介石日記

民國史研究的進展離不開史料的大量公開。中國大陸與台灣都已公開了大批檔案，而報紙、雜誌也大量實現了數字化，同時還出版了諸多日記。因此，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突飛猛進，不斷開拓出新的研究領域。

尤其在政治外交史領域，隨著政府與國民黨的檔案大量公開，關注決策過程的研究不斷湧現，對清朝、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的評價也逐漸轉變。而此前多為負面形象的政治家也開始得到肯定。

蔣介石日記無疑也呼應了這股史料公開的潮流。在台灣，隨著國民黨一黨獨裁的終結、蔣介石的走下神壇，檔案更加地公開，並在1990年代後形成常態。蔣介石日記的公開也與台灣內部的這一狀況密切相關。

當然，《蔣介石日記》的史料自身也存在著眾多疑點。首先，不可否認其本身歷經多次改動，有可能並非第一手史料。原本該日記即帶有蔣介石的官方記錄因素的色彩，它不一定是所謂的私人日記，而是以被他人所見為前提的。其次，須留意公開時有多少部分是做了非公開處理的。特別是蔣介石與陳潔如的關係等有可能是故意不予公開的。即便如此，該日記在分析蔣介石的想法、人物評價、心理變化等諸多方面仍有巨大意義。如在攘外安內政策的真意、抗戰過程中對戰局的認識、戰後構想、戰後的撤合作戰、反攻大陸的真意等方面都意義深遠。

然而，作為政治外交史考察時，應注意關於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公開的經過，與其他地區的政治外交史研究的方向不盡相同。例如德國的政治外交史研究，在分析納粹德國的對外關係方面先有以希特勒為主的研究；外交檔案被公開後，才改變了原先由首腦決定一切的印象，不同層級黨政機關部屬對決策的參與等詳細過程也逐漸浮現，此時，被相對化的獨裁體制和並非由領袖決定一切的史實才浮出水面。而中國的政治外交史研究，因外交等行政機關的檔案及黨務檔案先於領袖的史料被公開，反而會留下領袖在決策中作用很大的印象。

## 三、若干疑問

《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確實大大推動了蔣介石研究，其中最大的變化應是相對之前單純的討論或是解釋，更詳細的闡述了蔣介石在各種情況下的煩惱、認識及到決策的過程。但歷史不應以成敗來論英雄，應重視當時蘊含多種可能性的時代感，再以此進行判斷。歷史研究學者儘管熟知歷史的定局，但決不是裁斷過去的法官。如果從結果反推過去，再斷定其成敗，就會無視同時代的感覺。如果將來的歷史學家描寫我們現在的歷史時，卻與當下我們的感覺大相徑庭，這絕非好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蔣介石日記可謂給中國政治外交史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但是，細想之下，使用蔣日記的結果是否給中國近現代史的敘述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呢？這一點與檔案也有相通之處。檔案的使用，確實解密了眾多史實的細節，但並未給歷史敘述帶來突變。的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外交得到了肯定，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也得到了一定的評價。另外通過蔣介石日記，蔣的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方式及攘外安內的真意也一一得以呈現。但這是否就顛覆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敘述呢？答案又不盡然。這正證明了隨著立足於史料的研究累積，歷史是不斷進行著細微調整的，同時又是漸進變化的。

此外，還需要注意檔案及蔣介石日記的公開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因為過度依賴這種史料，最

終可能包含的危險性與只使用國共兩黨的史料集進行研究是相同的。換言之，或許結果不過是在構建一種新的官方敘述（official narrative）而已。對此，必須結合民間的多種史料，進一步對史料進行批判。例如對於蔣介石日記，如果過於相信日記中的內容，就會涉及到如何想像日記中未提部分的問題。因此，結合檔案史料及其他人物的日記等，來推敲未寫入日記的內容是極為重要的。

#### 四、日本的蔣介石研究動向

從民國史研究的興起到蔣介石研究進展的動向，都與日本學界的動向息息相關。如上所述，即使其目的與課題並不與中國完全一致，但仍成立了眾多民國史相關的研究會，並發行由野澤豐教授編纂的代表性雜誌《近鄰》等。關於蔣介石，也成立了以山田辰雄教授為首的“日本蔣介石研究會”。

這些研究會的共通課題包含如下三點：第一，相互切磋實證性的歷史研究，推動學術研究；第二，成為對外交流的窗口，促進國際交流；第三，通過這樣的研究和交流，在吸收海外研究動向的同時，傳遞“日本的視點與成果”。其中第三點又與日中近現代史的密不可分、相關史料保存在日本等有關。在蔣介石研究方面，這一點尤其明顯，或許是與對中國等蔣介石日記的研究潮流予以批判性探討有關。

日本的蔣介石研究在戰前已經存在，但在戰後的較長時期裡，因對國民黨的批判視角過強而未被列入研究對象。在山田辰雄等學者的引領下，1970年代起逐漸受到學界的關注。隨後，在民國史研究的興起，南京國民政府、重慶國民政府等相關共同研究的推動下，蔣介石成為主要的考察課題。近來，家近亮子分析中日戰爭的著作《蔣介石的外交戰略與日中戰爭》（岩波書店，2012年），可說是極具代表性的研究，該書運用了蔣介石日記、檔案以及日方史料。此外，在由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編著，作為日本蔣介石研究會活動成果出版的《蔣介石研究：政治・戰爭・日本》（東方書店，2013年）一書中，山田辰雄考察了蔣介石的日本經驗、日本對於蔣介石的意義，筆者也就《蔣介石秘錄》的意義進行了分析。但現存的蔣介石日記始於1917年，關於之前時期的研究並不多見。而《秘錄》與其他史料的關係如何，也有待考察。

如果追問日本的蔣介石研究對蔣介石本身的評價及歷史敘述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恐怕一時很難回答清楚。實際上，儘管實證的程度提高，敘述更為詳細，但並未帶來突出的變化。如前所述，這應該也是一種漸進性的變化。

儘管如此，通過日記的利用，新的研究契機也應運而生。例如從對日關係出發，與蔣介石交惡的人們，尤其是汪精衛成為關注的熱點。隨著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期心情矛盾的一面被揭示，中方學者對日本研究動向的關注提高，因此，諸多共同研究的契機也隨之增加。筆者期待今後繼續重視這種機遇，不斷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川島真，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博士。

**譯者簡介：**薛軼群，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助理教授。

[責任編輯 陳志雄]